

大資本併吞小資本？——1936年上海 《新聞報》在蘇州的聯合發行糾紛

高郁雅

摘要

上海《新聞報》（1893-1949）是近代中國第一大報，以經濟新聞著稱。1930年代，《新聞報》發行量攀上日銷15萬份的高峰後，因上海的小報從3日刊改成每日出版、成舍我創辦的小型報《立報》廣受歡迎，又極富盛名的天津《大公報》南下上海出版，不斷擠壓《新聞報》的發展空間。

為求突破，《新聞報》開闢第二戰場，積極拓展外埠銷路，鄰近的江蘇、浙江城市成為對象。1933年起，《新聞報》嘗試另外出版杭州、京滬路外埠附刊，也與蘇州《蘇民新聞》、武進《常州新聞》、蘇州《早報》、蘇州《小早報》等聯合發行，以買一報送一報的方式爭取讀者。但因《新聞報》挾著上海大報的雄厚資本而來，對當地報業造成極大衝擊，乃以「大資本併吞小資本」為訴求，對《新聞報》進行輿論撻伐。

1930年代是一黨專政的訓政體制，地方報業嗅出國民黨對上海大報的控制慾望，撥動其政治敏感的神經，幾次的反《新聞報》聯合發行案，都走呈請中央宣傳部介入的路線，打破《新聞報》的擴展計畫。

1936年3、4月間，《新聞報》與蘇州《早報》的聯合發行，是這類糾紛的代表，也是可研究的個案。因上海檔案館藏有大量的相關資料，如上海新聞報館與蘇州分館、南京分館的通信、和蘇州《早報》的往來文件、致國民黨中央宣傳部、南京《中央日報》的解釋呈文，以及一些蘇州當地報紙的剪報。本文以這些資料為基礎，擬勾勒《新聞報》致力外埠發展的源由及其所面臨的阻礙。

關鍵字：新聞報、蘇州報業、聯合發行

Did a Major Enterprise Swallow Up Small Businesses? The Controversy over the Joint Venture of Shanghai's *Shin Wen Pao* in Suzhou

Yu-ya Kao*

Abstract

Shin Wen Pao (1893-1949) of Shanghai was the most respected newspaper in regards to economic news in modern China. However, its growth was challenged after it reaching the peak of distributing 150,000 copies daily. This challenge came from the decision of changing the rate of publication from once at every three days to daily by several smaller newspapers such as *Li Pao* and the famous *Dagong Pao* of Tianjin entering the market of Shanghai.

In order to reverse this situation, *Shin-Wen Pao* decided to move into neighboring markets such as cities in Zhejiang and Jiangsu provinces, by publishing its own Hangzhou specials, Jinhulu town's articles, and by an attempt to make joint ventures with *Suminxinwen* of Suzhou, *Changzhouxinwen* of Wujin, *Zao Pao* of Suzhou, and *Xiaozhao Pao* of Suzhou to get more readers. In response to this expansion, other local newspapers published articles with titles such as "Major enterprises trying to swallow up small businesses" with a view to attacking *Shin Wen Pao* for its bringing along an enormous capital from Shanghai.

The smaller newspapers knew that the KMT was trying to control the media in Shanghai and to tighten its grip and enforcement of its absolute control over China. Therefore, the local newspapers asked the KMT Central Propaganda Agency to step in and break up several expansion attempts from *Shin Wen Pao*.

The joint venture of *Shin Wen Pao* and *Zao Pao* of Suzhou during March and April of 1936 was an example of such disputes and could be used as an example for a study like the present one. This essay attempts to sketch the reason, method and

*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History, Fu Jen Catholic University

process of *Shin Wen Pao's* expansion from Shanghai into other cities by using primary documents from the news archives of Shanghai such as letters between Shanghai *Shin Wen Pao* division, Suzhou subdivision, and Nanjing subdivision, documents from *Zao Pao* of Suzhou, memos to the KMT Central Propaganda Agency and *Nanjingzi Pao*, and local newspaper from Suzhou.

Keywords: *Shin Wen Pao*, Suzhou news industry, Joint Venture

大資本併吞小資本？——1936年上海 《新聞報》在蘇州的聯合發行糾紛*

高郁雅**

壹、前言

現代意義的報紙於清末傳入中國，其中上海《新聞報》（1893-1949），¹ 是歷史悠久、銷售量最大的一家。1893年英商丹福士創立該報，1899年由美商福開森接辦，命汪漢溪為經理。為配合上海的工商環境，《新聞報》以「輕政重商」為方針，重點放在經濟新聞，在工商業界擁有廣大的讀者，許多商店都訂《新聞報》放在櫃檯上給客戶看，而有「櫃檯報」之稱。² 1924年汪漢溪病逝後，由其子汪伯奇、汪仲韋接替管理，繼續推升《新聞報》，至1930年代銷售量突破15萬份，長期穩居中國報業的龍頭，此一紀錄到1949年中國大陸政權轉易前都沒有改變。

1936年3、4月，《新聞報》為拓展外埠銷路，與蘇州《早報》舉辦聯合發行，以買一報送一報的方式招徠讀者。蘇州同業群起抵制，《蘇州明報》、《吳縣日報》帶領刊登的抗議啟事就認為，這是「大資本併吞小資本之托拉斯企圖」：

* 本文承蒙二位匿名審查人提出許多寶貴的意見，特此感謝。

收稿日期：2013年6月25日；通過刊登日期：2013年8月8日。

** 輔仁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

¹ 抗戰爆發後《新聞報》留在上海發展，改成外國公司（以舊老闆福開森為監督），迴避日人的檢查。太平洋戰爭後，上海全面淪陷，《新聞報》遭日軍接管。戰後，《新聞報》因戰時的表現被打為漢奸報，遭國民黨改組成外圍黨報。中共建國後，《新聞報》被軍管封閉。

² 《新聞報》長沙通訊員陶菊隱於1921年到上海新聞報館，總經理汪漢溪帶他到城隍廟吃早點，領他在廟市逛一圈，然後問他看到什麼。陶菊隱當時答不出來，問了該報營業課長石瑞清，才知要他觀察出各商店櫃檯上擺的都是《新聞報》。參見陶菊隱，〈我所了解的新聞報〉，《新聞研究資料》，總第6輯（1981年7月），頁97-98。

《新聞報》若干年前，其一部分股單由西人福開森轉讓於國人申報故主人史量才先生時，該報曾以全力反對，連篇累牘煌煌巨幅廣告。……不料《新聞報》本身在此日趨鞏固之時，竟一再設法必欲摧殘內地同業。……己所不欲，勿施於人。³

指責《新聞報》「大資本併吞小資本」，是因《新聞報》成立已 43 年、日銷 15 萬份，發行量居全國之冠；而蘇州最大的《吳縣日報》（1928-1937）⁴ 創立僅 8 年、日銷 7,000 份，雙方實力差一大截。所謂「《新聞報》若干年前」故事，係指 7 年前《新聞報》與《申報》的股權風波：上海《申報》（1872-1949）⁵ 銷售量略遜《新聞報》，為中國第二大報，雙方競爭激烈。1929 年 1 月，因《申報》老闆史量才祕密購入福開森出脫的《新聞報》股票，引來《新聞報》職工的反彈，起身捍衛權益，興起「反報界托拉斯運動」。⁶ 當時《新聞報》深受《申報》史量才擴充兼併之苦，現卻也欺壓蘇州同業，故期盼《新聞報》「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1936 年《新聞報》在蘇州的發行糾紛，中國大陸學者古曉峰曾作過研究，⁷ 並使用上海檔案館典藏之新聞報檔案。筆者重新研究的原因有三：一、古曉峰主要參考〈新

³ 〈請全國新聞界同業公論並敬告上海新聞報〉，《吳縣日報》，蘇州，1936 年 3 月 27 日。

⁴ 《吳縣日報》前身為馬飛黃於 1916 年 10 月 10 日創立的四開小報《吳語》，馬飛黃於 1927 年因病告老，報館交胡覺民經營。1928 年 1 月胡覺民將報紙改為對開大報，並更名為《吳縣日報》。抗戰爆發、蘇州淪陷後，報社被日軍焚燬。

⁵ 《申報》為英商美查於 1872 年 4 月 30 日創立，美查歸國後，出讓給該報買辦席子佩。民初《申報》再行轉讓，由立憲派張謇等人收購，並任命史量才為總經理。後因張謇等人無心報館，《申報》漸成史量才個人的事業。抗戰爆發後，上海淪陷，《申報》因拒絕受檢而遷往漢口、香港發展，但不久重回上海，至太平洋戰爭爆發後被日偽挾持成為漢奸報。因漢奸報的罪名，戰後《申報》被國民黨改組為外圍黨報。中共建國後，《申報》被軍管封閉，原址改出《解放日報》。

⁶ 當時社會頗多關注，商界唯恐市場消息、廣告價格任其壟斷，刊登啟事支援《新聞報》；報業不滿《申報》獨強，報導、評論多站在《新聞報》一方；國民黨亦疑懼史量才的報業規模，出面遏止其擴充；最後史量才讓步，退出原本購得 65% 股份的 15%，由銀行界分購，並承諾不干涉《新聞報》的具體事務。參見詹佳如，〈報界、商界與政府：1929 年新聞報股權事件〉（上海：復旦大學新聞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10 年）。

⁷ 古曉峰、趙宗強，〈民國時期報業市場的利益與政治紛爭——1936 年上海新聞報在蘇州的發行糾紛事件〉，《新聞大學》，總第 888 期（2006 年第 2 期），頁 34-36；古曉峰，〈民國時期申報經營管理研究——兼與新聞報的比較〉（上海：復旦大學中國近現代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7 年），頁 11-15。

聞報館與外地同業糾紛卷〉(檔號 Q430-1-171)，而筆者發現〈新聞報館內部通告〉(檔號 Q430-1-176)、〈抗戰前新聞報兼辦新聞夜報、上海導報、晚報文書的文件〉(檔號 Q430-1-178)、〈新聞報館關於廣告、財務、報紙等事務卷〉(檔號 Q430-1-253)這 3 卷檔案也有相關史料，包含上海新聞報館與蘇州分館、南京分館的通信、和蘇州《早報》的往來文件，致南京中央宣傳部、南京《中央日報》的解釋呈文，以及蘇州當地報紙的剪報，能更細緻多元地處理問題；二、古曉峰較從《新聞報》的角度出發，筆者加入國民黨方面的資料，探究其對民營報紙的看法與規範；三、古曉峰著重聯合發行糾紛的過程，對《新聞報》涉足蘇州市場的背景沒有深談；筆者則將 1930 年代《新聞報》在上海的營運困境納入考慮，釐清該報向外埠發展的緣由。

貳、向外埠發展的背景

從結果來說，《新聞報》與《早報》聯合發行後，蘇州銷路從 2,000 多份增至 4,000 多份。身為全國第一大報的《新聞報》，為何在乎此區區之數？本節擬探究當時《新聞報》的經營狀態，理解它向外埠發展的動機。

在中國新聞史裡有個說法，現代化的報紙於清末由西方傳來，到 1928 年國民黨北伐結束，進入企業化發展的時代。如曾虛白在《中國新聞史》中談到：

從民國 15 年 7 月國民革命軍北伐，到民國 26 年 7 月抗戰爆發，是我國報業空前蓬勃的時代。此期的中國報業，不僅營利性的報紙又在企業化的道路上邁進一步，不少政治性的報紙亦向企業化大力推進，論者稱此現象為「企業化與政治化的合流」。

曾虛白認為原因有三：一、日本侵略壓力，使民氣高漲，刺激報紙銷路；二、工商進步，交通發展，環境有利報業滋長；三、報紙本身不斷改進，努力於社會服務與業務推廣。⁸ 曾在《申報》、《時事新報》服務的黃天鵬說：「從清末到民初的報紙，是由政論本位（以宣傳維新或革命為主）到新聞本位（以報導新聞為主，已漸趨商品化），報界已漸走上托拉斯，也有大集團的形成」。⁹ 中國大陸知名新聞史家方漢奇，

⁸ 曾虛白，《中國新聞史》，上冊（臺北：政治大學新聞研究所，1966 年），頁 351。

⁹ 黃天鵬，《天廬論叢》（臺北：黎明文化事業公司，1981 年），頁 9。

在其《中國新聞事業通史》也認為：「十年內戰期間，由於軍閥混戰的漸次結束，城市資本主義經濟和社會事業均有較明顯的發展，私營新聞事業也隨之呈現相對繁盛景象」，「報刊銷行數字迅速增長，新聞事業之間的競爭更趨激烈，一報多館、報業聯合和兼併等現象時而出現，報業托拉斯趨向也在中國開始了」。¹⁰

當時《新聞報》的規模如何？報紙發行量可分為三類：一、自稱份數，是報紙對外自稱的銷售數量，缺乏公信力，灌水誇大的成分居多，且包括耗損及退報的份數在內，較不客觀；二、估計份數，為利用報館以外的各種調查方式湊合而來的結果，或統計該報之印刷用紙消耗量、或估算報販人數、或計算該報的郵寄份數，最後將各種調查結果統合估算。雖較客觀，但數字籠統，只能得到大略的數字；三、證明份數，根據報館內部帳簿，仔細統計該報的收益情況，雖麻煩費時，卻最能得出精確的數字。¹¹ 曾在《大公報》、《文匯報》服務的徐鑄成，曾撰文回憶《新聞報》的「自稱份數」：

大約在 1935 年前，《新聞報》曾請一位名會計師到館監印，證明那天的印數是 18 萬餘份，第二天，由會計師簽字證明，在報上揭露。這是帶有招徠廣告作用的。這個數字，一直被認為解放前大報發行的最高紀錄。¹²

因上海檔案館有新聞報檔案，可從其內部資料得知「證明份數」，自 1893 年創刊至本文研究的 1936 年，整理如下表：¹³

¹⁰ 方漢奇主編，《中國新聞事業通史》，第 2 卷（北京：人民大學出版社，1996 年），頁 410。

¹¹ 趙君豪，《中國近代報業》（臺北：文海出版社，1983 年），頁 159。

¹² 徐鑄成，〈新聞報與汪漢溪〉，《報海舊聞》，北京第 1 版（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 年），頁 41-42。

¹³ 〈新聞報歷來銷路比較表〉，《新聞報概況》（上海：新聞報館，1931 年），上海圖書館藏。「新聞報近十年的統計表」（1931 年 11 月 23 日）、「新聞報 1935 年份對外公布銷數、1936 年擬定公布銷數」（1936 年 2 月 19 日），〈各個時期新聞報與主管機關報送關於主要職員工人情況調查〉，《申報新聞報檔案》，上海市檔案館藏，檔號：Q430-1-174；「新聞報館覆上海市通志館函」（1936 年 3 月 6 日）、「新聞報館覆上海市社會局函」（1936 年 12 月 14 日）、「新聞報館覆上海市通志館函」（1937 年 2 月 20 日）、「新聞報館覆南京實業部工業試驗所函」（1937 年 2 月 27 日），〈新聞報館關於廣告、財務、報紙等事務卷〉，《申報新聞報檔案》，上海市檔案館藏，檔號：Q430-1-253；胡道靜，〈新聞報四十年史（1893-1933）〉，《報學雜誌》，第 1 卷第 2 期（南京，1948 年 9 月 16 日），頁 11。

表 1、戰前《新聞報》銷售量統計表（1893-1936 年）

時間	銷售數	時間	銷售數
1893（光緒 19）	300	1924	105,727
1894（光緒 20）	3,000	1925	127,719
1900（光緒 26）	12,000	1926	141,717
1909（宣統 1）	14,486	1927	144,079
1912（民國 1）	19,418	1928	148,152
1914（民國 2）	23,629	1929	150,150
1916（民國 5）	33,045	1930	150,028
1919（民國 8）	45,782	1931	150,356
1920（民國 9）	50,788	1932	150,594
1921（民國 10）	59,349	1933	149,015
1922（民國 11）	74,284	1935	147,958
1923（民國 12）	81,737	1936	148,139

資料來源：〈新聞報歷來銷路比較表〉，《新聞報概況》，上海：新聞報館，1931 年 9 月，上海圖書館藏。「新聞報近十年的統計表，1931 年 11 月 23 日」、「新聞報 1935 年份對外公佈銷售數、1936 年擬定公佈銷售數，1936 年 2 月 19 日」，〈各個時期新聞報與主管機關報送關於主要職員工人工況調查〉，《申報新聞報檔案》，上海市檔案館藏，檔號：Q430-1-174。「新聞報館覆上海市通志館函，1936 年 3 月 6 日」、「新聞報館覆上海市社會局函，1936 年 12 月 14 日」、「新聞報館覆上海市通志館函，1937 年 2 月 20 日」、「新聞報館覆南京實業部工業試驗所函，1937 年 2 月 27 日」，〈新聞報館關於廣告、財務、報紙等事務卷〉，《申報新聞報檔案》，上海市檔案館藏，檔號：Q430-1-253。胡道靜，〈新聞報四十年史（1893-1933）〉，《報學雜誌》，第 1 卷第 2 期（南京，1948 年 9 月 16 日），頁 11。

由上可知，該報銷售量持續成長；但自 1927 年趨緩，1930 年甚至退步，之後數年徘徊在 15 萬份左右，沒有增長上去。

抗戰時期《新聞報》的檔案較少，戰後又有些銷售量數據，整理如下表：¹⁴

¹⁴ 「上海各大報比較、本埠各報銷數批價一覽表」（1946 年 2 月 26 日），〈申報館各種調查統計登記表·有申報社長、經理、主任簡歷表〉，《申報新聞報檔案》，上海市檔案館藏，檔號：Q430-1-11；〈一年來三報銷數一覽表〉（1947 年 8 月），《申報新聞報檔案》，上海市檔案館藏，檔號：Q430-1-25-77。

表 2、戰後《新聞報》銷售量統計表（1946 年 2 月至 1947 年 8 月）

時間	銷售數	時間	銷售數
1946.2	100,000	1947.2	152,500
1946.7	133,400	1947.3	136,900
1946.8	134,600	1947.4	135,400
1946.9	140,900	1947.5	124,800
1946.10	198,200	1947.6	127,100
1946.11	187,200	1947.7	123,200
1946.12	158,600	1947.8	125,000
1947.1	163,000		

資料來源：「上海各大報比較、本埠各報銷售數批價一覽表」（1946 年 2 月 26 日），〈申報館各種調查統計登記表〉，《申報新聞報檔案》，上海市檔案館藏，檔號：Q430-1-11。〈一年來三報銷售數一覽表〉（1947 年 8 月），《申報新聞報檔案》，上海市檔案館藏，檔號：Q430-1-25-77。

從上可知，除 1946 年 10、11 月因制憲國民大會召開、中共抵制不參加等時局的影響，《新聞報》的銷售數曾短暫達到 18、19 萬份，¹⁵ 其餘時間都未超過戰前的水準。

為何 1930 年代《新聞報》的銷售量無法持續成長？是被最大對手——上海《申報》搶走讀者嗎？申報館的出版品有記載該報銷售數，整理如下表：¹⁶

¹⁵ 1946 年 11 月 22 日報館第四次董事會議紀錄甚至顯示銷售數在 21 萬 4、5 千份左右。「新聞報館第四次董事會議紀錄」（1946 年 11 月 22 日），〈新聞報館 1930-1949 年股東常委會會議紀錄及董事會決議〉，《申報新聞報檔案》，上海市檔案館藏，檔號：Q430-1-261。

¹⁶ 李嵩生，〈本報之沿革〉，申報館編，《最近之五十年》，下冊，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第 90 輯（臺北：文海出版社，1923 年），頁 31；申報年鑑社編，《申報年鑑》（上海：申報售書科，1933 年），頁 R 二。

表 3、戰前《申報》銷售量統計表（1872-1933 年）

時間	銷售數	時間	銷售數
1872（同治 11）	600	1917	20,000
1874（同治 13）	1,200	1920	30,000
1876（光緒 2）	2,000	1921	45,000
1877（光緒 3）	5,000	1922	50,000
1912（民國 1）	7,000	1933	150,000
1916	14,000		

資料來源：李嵩生，〈本報之沿革〉，收入申報館編，《最近之五十年》，下冊，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第 90 輯（臺北：文海出版社，1923 年），頁 31；申報年鑑社編，《申報年鑑》（上海：申報書局，1933 年），頁 R 二。

這些數據出自對外發行的《最近之五十年》、《申報年鑑》，屬自稱份數，恐較高估。事實上，1930 年代《申報》銷售數接近 15 萬份，略少於《新聞報》。

抗戰時期《申報》的檔案較少，戰後又有些銷售量數據，整理如下表：¹⁷

表 4、戰後《申報》銷售量統計表（1945 年 12 月至 1947 年 12 月）

時間（年.月）	銷售數	時間（年.月）	銷售數
1945.12	37,580	1947.1	92,750
1946.1	53,271	1947.2	86,842
1946.2	62,171	1947.3	73,748
1946.3	64,935	1947.4	67,401
1946.4	63,151	1947.5	68,082
1946.5	67,053	1947.6	94,863
1946.6	71,045	1947.7	94,749
1946.7	72,884	1947.8	103,982
1946.8	81,640	1947.9	116,881
1946.9	88,407	1947.10	141,438
1946.10	97,116	1947.11	143,701
1946.11	103,466	1947.12	139,614
1946.12	97,873		

資料來源：「每日平均總發行數統計，1945 年 12 月至 1946 年 12 月」、「1947 年總發行數統計，1947 年 1 月至 12 月」，〈復刊一年來發行統計〉，《申報新聞報檔案》，上海市檔案館藏，檔號：Q430-1-76。

¹⁷ 「每日平均總發行數統計」（1945 年 12 月至 1946 年 12 月）、「1947 年總發行數統計」（1947 年 1 月至 12 月），〈復刊一年來發行統計〉，《申報新聞報檔案》，上海市檔案館藏，檔號：Q430-1-76。

從上可知，《申報》與《新聞報》的情形類似，戰後銷售數皆不如戰前，1930 年代是二大報發展頂峰，同樣出現停滯不前的情形。

什麼原因限制了《新聞報》、《申報》銷售數發展？中國大陸著名上海新聞史專家秦紹德，以辦報成本解釋此一現象。因報社的大部分開支（資產折舊、人事薪資等，約占 2/3）固定不變，不隨發行量的增加而增加；故銷售量愈多，每報的成本愈低，隨銷售量而來的廣告更能帶來利潤。秦紹德分析，民初報紙銷售量超過 2 萬份即達贏利階段（《新聞報》在 1914 年、《申報》在 1916 年），之後隨著利潤的刺激，二報銷售量猛增，10 年間（至 1926 年）增加 6 倍，達 15 萬份左右。但超過這個水準，紙張、油墨的成本又變多，反使利潤下降，故二報將銷售量維持在能贏利的最高水準，不再一味衝高。¹⁸

《新聞報》協理汪仲韋證實這個觀點：「當報紙銷路發展到一定數量，廣告越來越多，勢必增加張數。超過五大張，售報收入就要不夠紙張成本，這是一個矛盾」。¹⁹因廠商愛在第一名的媒體下廣告，《新聞報》只需維持領先的位置，不求銷售量的再增加。報館的最大利潤來自廣告，本文討論的聯合發行是個辦法，可增加其他城市的廣告來源；另一辦法是針對上海的讀者、廠商，提供專門的「本埠附刊」。《新聞報》分析各類廣告內容，發覺部分廣告（如戲院廣告、無全國市場的小商品廣告）對外埠讀者沒有作用，故推出「本埠附刊」：以廣告為主要內容，夾登本埠小新聞及遊藝類小品文，隨報附送，不銷外埠。在「本埠附刊」登廣告比正張便宜，這樣廣告戶減輕負擔，報館多納廣告，又節省紙張，讀者不需另外付費卻多得報紙，似乎是三方得利。但曾在《新聞報》服務的陶菊隱指出新問題：因「本埠附刊」廣告刊例較廉，而該報又以上海讀者為大宗，故「本埠附刊」的廣告越來越多，附刊張數常增至與正張相等，形成本末倒置的現象。1926 年 4 月 1 日「本埠附刊」創刊；至抗戰爆發上海周遭成為戰地，《新聞報》無法銷往外埠，於 1937 年 8 月 15 日停發「本埠附刊」。²⁰

不過筆者認為，還有兩個原因使 1930 年代《新聞報》發展趨緩。第一，小報的因素。小報即西方所指的「蚊子報」（Mosquito Paper），不競爭新聞，不重視言論，

¹⁸ 秦紹德，《上海近代報刊史論》（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1993 年），頁 115-117。

¹⁹ 汪仲韋，〈我與新聞報的關係〉，《新聞研究資料》，總第 11 輯（1982 年 5 月），頁 134。

²⁰ 陶菊隱，〈新聞報發家史〉，《文史資料選輯》，第 4 輯（北京：中華書局，1980 年第 3 版），頁 140。

以揭發名人隱私、報導社會花絮為務，如夏夜之蚊擾人清夢。小報主要在上海、北京、天津等城市出現，其中又以工商業高度發展的上海為最。上海小報起於 1897 年 6 月 24 日創刊的《遊戲報》，由譴責小說家李伯元主編，最後一張是 1952 年 11 月 20 日停辦的《亦報》，歷經 52 年，總數在 1 千種以上。1930 年代上海小報有三個變化：一、從早期的 3 日刊轉成日刊，自 1929 年 11 月 1 日《社會日報》創刊後，把原本 3 日刊的小報壓倒，於是 3 日刊紛紛轉為日刊，²¹ 如上海小報的「四大金剛」：《晶報》（1919 年 3 月 3 日創刊，1932 年 10 月改為日刊）、《金鋼鑽》（1923 年 10 月 18 日創刊，1932 年 8 月 1 日改為日刊）、《福爾摩斯》（1926 年 7 月 3 日創刊，1931 年 9 月 1 日改為日刊）、《羅賓漢》（1926 年 12 月 8 日創刊，1935 年 5 月 1 日改為日刊）。²² 二、小報開始刊載新文學家的作品，之前小報是舊文學的障地，與新文學壁壘分明。1930 年代在《社會日報》陳靈犀的努力下，邀曹聚仁、魯迅、柯靈等新文學家撰文，提高小報的社會地位，《社會日報》之銷售量增至 2 萬份。²³ 三、大報式小報的出現，如成舍我於 1935 年 9 月 20 日創辦的《立報》，提出「小型報」的說法。用大報規格辦小報，重視新聞與言論，文字精簡，甚受都會市民的喜愛，銷售量達到 10 萬份。²⁴ 小報在 1930 年代的奮起，衝擊《新聞報》、《申報》等大型日報的市場。

第二，《大公報》上海版的創刊。《大公報》原是天津的報紙，1902 年 6 月 17 日由英斂之創立，立場鼓吹君主立憲。1926 年 9 月被吳鼎昌、胡政之、張季鸞接辦後，強調獨立自主的辦報方針，重視政治評論。銷售量雖略遜上海《新聞報》、《申報》，但不同於《新聞報》、《申報》為工商業者服務，《大公報》以知識分子為對象，在輿論界享有更高的地位。1931 年九一八事變後，華北日益特殊化，1935 年 6 月中、日簽訂「何梅協定」後，環境更加困難。《大公報》於是籌辦上海版，1936 年 4 月 1 日出版，原天津版繼續發行，至 1937 年抗戰爆發後，於 8 月 4 日停刊。挾著雄厚歷史與資本的《大公報》南來，衝擊上海原有的報業市場，《新聞報》、《申報》聯手抵制，創刊最初 3 天，批給報販的《大公報》全被《新聞報》、《申報》搜刮而去，最後請上

²¹ 孟兆臣，《中國近代小報史》（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5 年），頁 87。

²² 李楠，《晚清民國時期上海小報》（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6 年），頁 387、390、394-395。

²³ 洪煜，《近代上海小報與市民文化研究（1897-1937）》（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7 年），頁 68-69。

²⁴ 成舍我，〈由小型報談到立報的創刊〉，《報學雜著》（臺北：中央文物供應社，1956 年），頁 118-143。

海聞人杜月笙出面請客疏通，才得以與讀者見面。²⁵ 到 1936 年下半年，《大公報》上海版的印數已超過 5 萬份，²⁶ 嚴重威脅《新聞報》的銷路。《新聞報》、《早報》於 1936 年 3 月聯合發行，《大公報》上海版在該年 4 月 1 日出版，時間上有絕對的關連性，當時《誠報》就指出：「上海《新聞報》因《大公報》南遷，而亦欲力謀內地銷路發展」。²⁷

面對新聞環境的變化，《新聞報》向外尋找出路，鄰近的江、浙城市成為首要目標。1930 年該報平均日銷 150,028 份，包含全國各地的份數如下表：²⁸

表 5、《新聞報》各地銷售數量表（1931 年 9 月）

地名	銷售數	地名	銷售數	地名	銷售數	地名	銷售數	地名	銷售數
上海	61,080	江蘇	37,537	浙江	18,750	安徽	13,701	山東	3,859
河南	3,595	江西	3,069	湖北	2,509	湖南	1,550	河北	1,141
福建	879	雲南	413	日本	352	遼寧	343	吉林	312
黑龍江	310	廣東	134	歐美	122	陝西	99	山西	84
南洋	54	甘肅	50	廣西	40	四川	25	貴州	20

資料來源：〈新聞報各地銷售數表〉，《新聞報概況》（上海：新聞報館，1931 年，上海圖書館藏）。

由上可知，上海市占 41%，江蘇省 25%，浙江省 12%，三者合占 78%，成為該報讀者的大宗。另外兩年的該報檔案中紀錄：1935 年銷售數 147,958，本埠占 64%，外埠 36%；1936 年銷售數 148,139，本埠 54.75%，外埠 45.25%，²⁹ 外埠市場占該報發行的重要比例。

²⁵ 徐鑄成，《徐鑄成回憶錄》（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9 年），頁 63。

²⁶ 周雨，《大公報史》（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3 年），頁 35-40。

²⁷ 〈蘇三大報之火拼談〉，《誠報》，上海，1936 年 3 月 28 日（剪報檔案，無註明版次）。

²⁸ 〈新聞報各地銷數表〉，《新聞報概況》（上海：新聞報館，1931 年，上海圖書館藏）。

²⁹ 「新聞報 1935 年份對外公佈銷數、1936 年擬定公布銷數」（1936 年 2 月 19 日），〈各個時期新聞報與主管機關報送關於主要職員工人工況調查〉，《申報新聞報檔案》，上海市檔案館藏，檔號：Q430-1-174。

叁、聯合發行的內涵

對《新聞報》來說，1936 年與蘇州《早報》的聯合發行不是首次嘗試，之前即有向外發展的經驗。《申報》、《新聞報》一向重視蘇、浙兩省的銷路，以杭州來說，早晨 8 時報紙從上海坐特別快車、到杭州已是中午 12 時，經分館轉送訂戶，往往遲至下午 2 時。加上地方報紙日益進步，開始用各地專電及外國通訊社譯稿，上海報紙逐漸不如便宜又快速的當地報紙。為扭轉頹勢，1933 年初聯合加出《申報新聞報杭州附刊》，訂戶早晨先閱杭州附刊，下午再看上海的報紙。³⁰ 同年 2 月 3 日，《新聞報》又發行《京滬路外埠附刊》，以京滬鐵路沿線的南京、鎮江、常州、無錫、蘇州等 5 市訂戶為對象。該附刊有半張兩個版，內容為國內外新聞、京滬路沿線各埠消息、上海經濟、小說等，³¹ 深夜 11 時在上海報館印出後，從滬北站坐夜火車，沿途在南京、鎮江、常州、無錫、蘇州卸貨，各分館次晨派人至車站提取。³² 報館圖的是外埠廣告，新聞報館向各分館強調，「凡當處地方報上所有之廣告戶，務希按圖索驥，廣為招攬」。³³ 《新聞報》的附刊造成地方報紙的巨大壓力，包括原本銷路最大、國民黨的《東南日報》。³⁴ 《浙民日報》社長串連杭州新聞記者公會，以該附刊不取報資，「破壞同業慣例、希冀消滅地方報紙、包辦輿論」，「請中央設法制止」。³⁵

所謂的「中央」指的是中宣會，原名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宣傳部（簡稱中

³⁰ 《新聞報》協理汪仲韋回憶，《新聞報》蘇、浙兩省的銷路多於《申報》，杭州附刊是《新聞報》的點子，《申報》接著要求合辦。見汪仲韋，〈又競爭又聯合的新、申兩報〉，《新聞研究資料》，總第 15 輯（1982 年 8 月），頁 81-82。

³¹ 〈新聞報發行外埠附刊〉，《武進中山日報》，武進，1933 年 2 月 4 日（剪報檔案，無註明版次）。

³² 「新聞報館致南京、鎮江、常州、無錫、蘇州分社函」（1933 年 1 月 31 日），〈新聞報館與外地同業糾紛卷〉，《申報新聞報檔案》，上海市檔案館藏，檔號：Q430-1-171。

³³ 「新聞報館致南京、鎮江、常州、無錫、蘇州分社函」（1933 年 2 月 1 日），〈新聞報館與外地同業糾紛卷〉，《申報新聞報檔案》，上海市檔案館藏，檔號：Q430-1-171。

³⁴ 汪仲韋，〈又競爭又聯合的新、申兩報〉，《新聞研究資料》，總第 15 輯（1982 年 8 月），頁 81-82。

³⁵ 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祕書處，〈中央祕書處致中央宣傳委員會函〉，《中央黨務月刊》，第 56 期（1933 年 3 月），頁 1332-1333。

宣部)，1924 年國民黨改組時成立，負責黨的對外文告、宣傳事務，其下有中央通訊社、中央無線電臺、中央日報社與各直轄黨報等。在一黨專政的訓政時期，中宣部不僅是黨的新聞最高決策機關，也成為掌管全國新聞事業的重心。1931 年九一八事變後，國民黨中央擴大部會組織，中宣部改組為中央宣傳委員會（簡稱中宣會）。³⁶ 為了遏止《新聞報》的擴張，國民黨浙江黨部派員至南京，與內政部洽商取締辦法。但內政部認為「出版法」並無禁止地方版之明文，若非中央另予決定，否則無法拒絕登記。於是提交國民黨中央第六十二次常務會議，決議：「各報附刊只許附同本報發行，不許單獨發行，如查出附刊單獨發行者，准由地方同業提出損害賠償」，³⁷ 《申報》、《新聞報》的杭州附刊出版執照被吊銷，《新聞報》的京滬路外埠附刊也淪為泡影。

之後《新聞報》另想新途，1934 年改與蘇州新創的《蘇民新聞》聯合發行，買一報送一報。蘇州當地報業受到威脅，呈請中宣會處理，5 月 17 日寄出的新聞法令通函，將「六十二次常務會議決議」追加規定：一地報紙不能在其他地方，利用該地原有報紙，或創一地方報，以無代價附送或分次發行，「改頭換面居地方附刊之實」。³⁸ 與《蘇民新聞》之合作案破局後，《新聞報》同年 10 月又另起爐灶，與 8 月 1 日才創刊的武進《常州新聞》聯合發行。《常州新聞》發行人范拜在寫給中宣會的陳情書中，強調兩報合訂只是「減輕讀者負擔」，「為地方文化著想」，絕非免費贈報。《常州新聞》「獨立性質絕對不受任何方面津貼」，報館地址與《新聞報》常州分館位址不同，兩者「風馬無關」。³⁹ 但在當地報業的杯葛下，最終還是沒有得到中宣會的許可。

接下來就是本文的主題，《新聞報》再接再厲，1936 年 3、4 月又謀與蘇州《早報》聯合發行。當時蘇州報業的生態為：銷售量第一的報紙《吳縣日報》，1935 年 12 月從日本引進蘇州首臺輪轉印刷機，銷售量突破 7,000 份。⁴⁰ 排名第二的《蘇州明報》

³⁶ 關於國民黨的新聞宣傳單位，參見王凌霄，《國民黨新聞政策之研究（1928-1945）》（臺北：中國國民黨黨史會，1996 年）。

³⁷ 「中央祕書處致中央宣傳委員會函」（1933 年 3 月 23 日），《中央黨務月刊》，第 56 期（1933 年 3 月），頁 1332-1333。

³⁸ 〈請全國新聞界同業公論並敬告上海新聞報〉，《吳縣日報》，蘇州，1936 年 3 月 27 日（剪報檔案，無註明版次）。

³⁹ 「常州新聞社發行人范拜所致中央黨部函」（1934 年 10 月 5 日），〈新聞報館與外地同業糾紛卷〉，《申報新聞報檔案》，上海市檔案館藏，檔號：Q430-1-171。

⁴⁰ 諸家瑜，〈帶吳字的蘇州老報紙〉，《中國地方誌》，2007 年第 8 期，頁 43-44。

(1925-1937)，⁴¹ 銷路原在 3,000 份左右，1936 年初改用新字體，大事報導民眾感興趣的盜搶奸拐、捉姦新聞，趁著《吳縣日報》剛換印刷機時常脫班，銷路暴增 7、800 份。⁴² 排名第三的是《早報》(1935-1937)，⁴³ 創刊較晚，雖因印刷清晰、編制新穎，加上主持人努力經營，發展甚速，但終難突破前兩大報，銷路只有 1 千幾百份。眼看《蘇州明報》聲勢重振，而《吳縣日報》適應新機後也會回升，乃另闢途徑，與上海《新聞報》合作。⁴⁴《新聞報》在蘇州曾經日銷 5,000 份，但《吳縣日報》、《蘇州明報》奮起後跌到 2,000 份，⁴⁵ 為維持銷售數，故與《早報》聯合發行。⁴⁶

1936 年 3 月 20 日二報簽訂合同：從 1936 年 3 月 21 日開始，在《新聞報》蘇州分館銷報區域，凡聯合訂閱二報之訂戶，只收《新聞報》一報的價格。每晨《新聞報》將所需《早報》份數在發印前告知，早報館再將這些《早報》送達《新聞報》蘇州分館。新聞報館不用給早報館編輯印刷費用，而採逐月遞減方式，補貼其用紙。⁴⁷ 閱戶可選擇只訂《早報》，只付該報費用（較《新聞報》低），歸早報館所有。但這些不屬於聯合發行的《早報》，早報館需以市價向《新聞報》購紙，使所有《早報》紙張

⁴¹ 《蘇州明報》前身為孫癡人於 1924 年 2 月 23 日創立的四開小報《明報》，1925 年 2 月盤給該報股東、總務主任、法政新聞記者張叔良。張叔良將報紙改為對開大報，並更名為《蘇州明報》。抗戰爆發後該報關閉，戰後復刊，由張叔良兒子張慶承主持，經營至 1949 年被中共接收。

⁴² 茉莉，〈蘇州三大報之生存競爭，吳縣明報呼籲全國報界〉，《蘇州民聲》，蘇州，1936 年 3 月 28 日。

⁴³ 1935 年 1 月，夏旦初、顏益生接辦《十日旦報》，改組為《早報》。抗戰爆發、蘇州淪陷後，該報被汪知心劫去，1937 年 12 月 21 日改辦服務日偽的《蘇報》。

⁴⁴ 太乙，〈吳縣明報反對新聞報早報聯合發行，蘇民新聞又殺出一個程咬金來〉，《大吳語》，蘇州，1936 年 3 月 28 日。

⁴⁵ 蘇州報業漸次發展，如 1916 年《吳縣市鄉公報》開始有印刷機，1925 年當地最早的蘇聞通訊社創辦，1926 年《蘇州明報》用長途電話收發上海通訊社電訊消息，1932 年《蘇州明報》派記者採訪一二八事變、出號外報導戰況，1936 年《吳縣日報》自備收報機接收電訊消息、從日本進口輪轉印刷機等。

⁴⁶ 「錢新之、葉琢堂、汪伯奇致葉楚傖函」（1936 年 3 月 31 日），〈新聞報館關於廣告、財務、報紙等事務卷〉，《申報新聞報檔案》，上海市檔案館藏，檔號：Q430-1-253。

⁴⁷ 第 1-3 個月給聯發份數耗紙之全部、第 4 月給 9 成、第 5 月給 8 成、第 6 月給 7 成、第 7 月給 6 成、第 8 月給 5 成，之後《早報》若廣告收入改善，經雙方同意再遞減下去。

統一。⁴⁸

就規模、歷史而言，上海《新聞報》遠大於蘇州《早報》，於是有這些看似苛刻的條件。但報館主要收入是廣告，《早報》雖「不惜犧牲，本身報價，附設於《新聞報》內」，⁴⁹但衝高銷售量能提振廣告，還是很有利潤。對《新聞報》來說，出點紙張，讓訂戶得到免費的《早報》，當然有助於蘇州當地的銷路。為了宣傳，《新聞報》、《早報》在報上刊登廣告，主打「看兩份報僅等於一份報紙之代價」（圖 1）。⁵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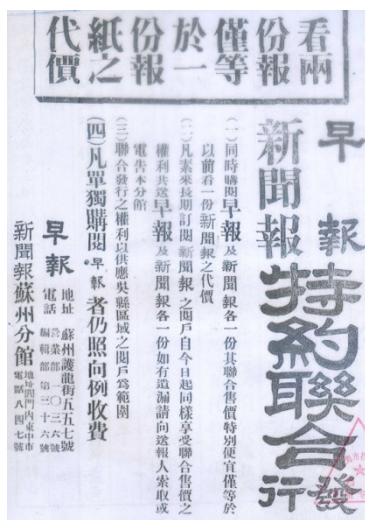


圖 1、《早報》刊登〈《早報》、《新聞報》特約聯合發行〉影像圖

資料來源：〈早報、新聞報特約聯合發行〉，《早報》，蘇州，1936 年 3 月 22 日（剪報檔案，無註明版次）。

因有參與聯發及不參與聯發的兩種《早報》，早報館將參與聯發的，「於報眉下印

⁴⁸ 「蘇州早報館與新聞報館聯合發行辦法合同」（1936 年 3 月 20 日），〈新聞報館與外地同業糾紛卷〉，《申報新聞報檔案》，上海市檔案館藏，檔號：Q430-1-171。

⁴⁹ 木牛，〈早報風潮平息，加收國幣五厘了事〉，《大吳語》，蘇州，1936 年 3 月 24 日（剪報檔案，無註明版次）。

⁵⁰ 〈早報、新聞報特約聯合發行〉，《早報》，蘇州，1936 年 3 月 22 日（剪報檔案，無註明版次）。

一聯字，加上一紅色之邊」。⁵¹ 但計劃在 21 日問世的「紅邊之早」，卻遲至兩天後（23 日）才出現。⁵² 問題來自蘇州當地的報販，之前分送兩報，月得 1 元 8 角 5 分，聯合發行後，兩報共得 1 元 3 角 5 分。⁵³ 「派報人不但毫無利益，且須為早報白奔」，⁵⁴ 「吃自己飯，而為人白做事者，天下固無此傻瓜」，⁵⁵ 故群起反對。吳縣報夫職業工會在《吳縣日報》、《蘇州明報》刊登啟事，為他們不願送報提出解釋。表示 21 日《新聞報》與《早報》登出的聯合發行廣告，與其理解的「諸事實不符合」。20 日《新聞報》與《早報》簽約後，曾「邀本工會理監事為聯合發行接洽」，本理監事「答覆關係會員生計」，須待 21 日開會員會議後答覆。「詎料上海《新聞報》與蘇州《早報》竟不及等待本會之答覆，先期登報施行，深恐閱戶有生誤會，特此登報聲明」（圖 2）。⁵⁶



圖 2、《蘇州明報》刊登〈吳縣報夫職業工會聲明啟事〉影像圖

資料來源：〈吳縣報夫職業工會聲明啟事〉，《蘇州明報》，蘇州，1936 年 3 月 22 日（剪報檔案，無註明版次）。

-
- ⁵¹ 〈早報聯合發行之糾紛〉，《蘇州民聲》，蘇州，1936 年 3 月 23 日（剪報檔案，無註明版次）。
- ⁵² 六安，〈早報糾紛和解〉，《蘇州民聲》，蘇州，1936 年 3 月 24 日（剪報檔案，無註明版次）。
- ⁵³ 〈提倡消費合理，新聞報與早報聯合發行糾紛〉，《蘇州民聲》，蘇州，1936 年 3 月 22 日（剪報檔案，無註明版次）。
- ⁵⁴ 木牛，〈早報風潮平息，加收國幣五厘了事〉，《大吳語》，蘇州，1936 年 3 月 24 日（剪報檔案，無註明版次）。
- ⁵⁵ 太乙，〈吳縣明報反對新聞報早報聯合發行，蘇民新聞又殺出一個程咬金來〉，《大吳語》，蘇州，1936 年 3 月 28 日（剪報檔案，無註明版次）。
- ⁵⁶ 〈吳縣報夫職業工會聲明啟事〉，《蘇州明報》，蘇州，1936 年 3 月 22 日。

新聞報館與蘇州早報館的合作十分倉促，在上海檔案館的新聞報檔案裡，可找到雙方以毛筆字草擬的合同，原本立約時間是3月19日、後塗改為20日；聯合發行的啟動時間，也從最初的21日、一度改為23日、最後又變回21日。⁵⁷《新聞報》蘇州分館負責人程寅生21日晨寫給上海總館的信中，⁵⁸流露出急於求成、自我感覺良好的心態：20日與早報館簽約後，與報伏工會正副會長「談之良久」，晚上再和《早報》3位負責人，請報伏工會執監幹事7人在中央飯店晚餐，「盡歡而散」。信中還詳細叮嚀出報事宜：「今晨6時先發《早報》」，「7時25分汽車到蘇，45分發本報」，「《吳縣日報》、《明報》約7時出版」，「最好本報提早開車」，以搶先機。報伏工會今下午開全體大會，「雖然少數人略有反對」，但「大約不成問題」。⁵⁹後來報伏工會拒絕送報、大登反對啟事，可見一頓晚宴無法疏通歧見；報伏不滿少一份送報收入，更氣《新聞報》、《早報》忽視默契，不待報伏工會開會就直接偷跑。

恐風潮擴大，3月22日《新聞報》妥協，加價求得報伏工會諒解，23日起的聯合發行廣告，已變更訂報價格，每日加價5厘。⁶⁰一個月30天計算，等於「按月加費1角5分」，加上原送《新聞報》的收入，共得1元5角。雖還是比之前分送兩報少3角5分，但報伏工會與《新聞報》「互退讓步」，聯合發行的《早報》終於在23日開始派送。⁶¹對《新聞報》來說，報伏工會的作梗提高派報成本，心中自然不樂，23日該報致信蘇州分館，還要求與報伏工會交涉：既然加價已讓「工會認為滿意，

⁵⁷ 「蘇州早報館與新聞報館聯合發行辦法合同」（1936年3月20日），〈新聞報館與外地同業糾紛卷〉，《申報新聞報檔案》，上海市檔案館藏，檔號：Q430-1-171。

⁵⁸ 《新聞報》蘇州分館經理原為錢道邨，1932年程寅生接任，錢道邨於1933年過世。

⁵⁹ 「程寅生致總理協理函」（1936年3月21日），〈新聞報館與外地同業糾紛卷〉，《申報新聞報檔案》，上海市檔案館藏，檔號：Q430-1-171。

⁶⁰ 「曹慎之致余樹立函」（1936年3月22日），〈新聞報館與外地同業糾紛卷〉，《申報新聞報檔案》，上海市檔案館藏，檔號：Q430-1-171。根據曾任該報長沙通訊員的陶菊隱回憶，1921年他第一次到上海拜訪新聞報館，發現並無與他經常聯繫的曹慎之。原來「曹慎之」是報館與各地通訊員聯絡時的化名，因各地通訊員常有本職，私下兼差幫報館探查新聞，為保護其工作之隱密，不使用真名交往。見陶菊隱，《記者生活三十年——親歷民國重大事件》（北京：中華書局，2005年），頁63。

⁶¹ 六安，〈早報糾紛和解〉，《蘇州民聲》，蘇州，1936年3月24日（剪報檔案，無註明版次）。

自應由該工會出面再登一廣告聲明照送，以免讀者誤會」。⁶²此一要求當然沒有達成，因更大反彈接踵而來，複雜的蘇州報業生態非上海《新聞報》所能預測。

肆、報紙同業的反應

蘇州報伙工會雖接受《新聞報》的加價補貼，使糾紛初步排除；但〈吳縣報伙職業工會聲明啟事〉3月22日選擇在《吳縣日報》、《蘇州明報》刊登，顯示反對聯合發行的不只有報伙工會。

《吳縣日報》、《蘇州明報》是蘇州的前兩大報，銷售量第三的《早報》與上海大報聯合發行，勢必打擊二報的原有市場。3月28日《蘇州民聲》就披露：「該項辦法實現後，《早報》銷路果然大漲」，從1千幾百份增至4,000份。⁶³《吳縣日報》、《蘇州明報》平日雖然對峙，然此次聯合發行利益相關，乃攜手抵制。⁶⁴事實上，21日下午報伙工會開會員會議討論聯合發行時，《吳縣日報》社長胡覺民、《蘇州明報》社長張叔明皆出席下指導棋，⁶⁵遂有〈吳縣報伙職業工會聲明啟事〉於22日在《吳縣日報》、《蘇州明報》的刊出。

但因《新聞報》同意加價，報伙工會抵制兩天就妥協，《吳縣日報》、《蘇州明報》無法繼續煽動報伙，乃決定升高反對層級，訴諸輿論以壯聲勢。3月27日《吳縣日報》刊出〈請全國新聞界同業公論並敬告上海新聞報〉，直指《新聞報》違反中央法令：國民黨一向關注報館的擴張問題，「前年上海之報社為謀畸形發展，曾有杭州地方版之創刊，經杭州同業以此組織有背輿論自由性質」，呈請中央處理。當時中宣會作出第六十二次議決，規定報紙不得易地發行附刊、不得分次送報、不得免費贈送。

⁶² 「經理處致程寅生函」（1936年3月23日），〈新聞報館與外地同業糾紛卷〉，《申報新聞報檔案》，上海市檔案館藏，檔號：Q430-1-171。

⁶³ 茉莉，〈蘇州三大報之生存競爭，吳縣明報呼籲全國報界〉，《蘇州民聲》，蘇州，1936年3月28日（剪報檔案，無註明版次）。

⁶⁴ 末香，〈反對新聞報早報聯合〉，《吳縣晶報》，蘇州，1936年3月28日（剪報檔案，無註明版次）。

⁶⁵ 〈早報聯合發行之糾紛〉，《蘇州民聲》，蘇州，1936年3月23日（剪報檔案，無註明版次）。

現在《新聞報》、《早報》又謀聯合發行，雖加價 1 角 5 分，但那是給報伙的錢，「事實上，《早報》依然為《新聞報》無代價贈送之異地附刊」，與中央法令相悖，請全國同業公論支持（圖 3）。⁶⁶



圖 3、《蘇州明報》刊登〈請全國新聞界同業公論並敬告上海新聞報〉影像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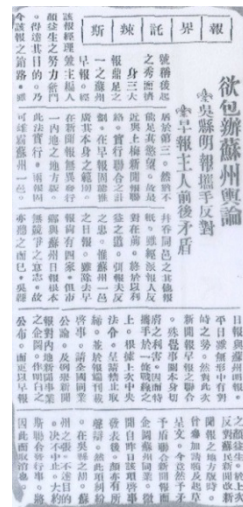
說明：《蘇州明報》3 月 27 日沒刊登該啟事，曾引起《大吳語》、《蘇州民聲》等報的揣測，以為《蘇州明報》與《吳縣日報》不同調；但 28 日《蘇州明報》就開始刊登該啟事。

資料來源：〈請全國新聞界同業公論並敬告上海新聞報〉，《吳縣日報》，蘇州，1936 年 3 月 27 日（剪報檔案，未註明版次）。

圖 4、《大公報》刊登〈報界託辣斯，欲包辦蘇州輿論，吳縣明報攜手反對，早報主人前後矛盾〉影像圖

說明：《大公報》此文，與同天蘇州《吳縣晶報》末香寫的〈反對新聞早報聯合〉，內文完全一樣，版面樣式也類似，《吳縣晶報》的該名作者，可能身兼《大公報》蘇州特約通訊員。

資料來源：〈報界託辣斯，欲包辦蘇州輿論，吳縣明報攜手反對，早報主人前後矛盾〉，《大公報》，天津，1936 年 3 月 28 日（剪報檔案，無註明版次）。



⁶⁶ 〈請全國新聞界同業公論並敬告上海新聞報〉，《吳縣日報》，蘇州，1936 年 3 月 27 日（剪報檔案，無註明版次）。《蘇州明報》3 月 27 日沒刊登該啟事，曾引起《大吳語》、《蘇州民聲》等報的揣測，以為《蘇州明報》與《吳縣日報》不同調；但 28 日《蘇州明報》就開始刊登該啟事。

這篇啟事果真引起同業關注，包括：第一，蘇州其他報紙，衝擊其既得利益，乃加入批判行列，如《吳縣晶報》、⁶⁷《蘇州民聲》等。⁶⁸ 第二，因聯合發行影響上海其他大報的蘇州銷路，⁶⁹ 故也撰文關心，如《大公報》3月28日的〈報界託辣斯，欲包辦蘇州輿論，吳縣明報攜手反對，早報主人前後矛盾〉（圖4）。⁷⁰ 第三，在《吳縣日報》的鼓動下，傳言聯合發行只是過渡、《新聞報》將遍於內地較大商埠，內地報紙以切身利害關係，紛紛刊登反對啟事。第四，國民黨有關的黨政報紙，如南京《中央日報》等5報，都配合政策義務轉載。⁷¹

然而也有些蘇州報紙不完全隨《吳縣日報》、《蘇州明報》起舞，時有看好戲的譏諷文字。《蘇民新聞》是個明顯的例子，該報兩年前（1934）創刊時，也與《新聞報》醞釀聯合發行，但受到蘇州同業抵制，呈請國民黨介入後破局。1936年3月《新聞報》改與《早報》合作，22日〈吳縣報伏職業工會聲明啟事〉刊出後，引起《蘇民新聞》慨嘆，在其夕刊表示：「本報發刊之初，便利蘇州讀者起見」，曾與《新聞報》聯合發行，「詎為《吳縣日報》、《蘇州明報》等同業反對」，《蘇州明報》張叔明與《早報》顏益生代表赴京，「進謁當局請求抵制」，使合作中斷。現在《早報》、《新聞報》又謀聯合發行，報上廣告「與本報初刊時主張，完全相同」；報伏工會的拒絕派報，「情形又完全與本報二年前初創時所受之痛苦相同」。⁷²

⁶⁷ 末香，〈反對新聞報早報聯合〉，《吳縣晶報》，蘇州，1936年3月28日（剪報檔案，無註明版次）。吳國熊於1931年創辦《吳縣晶報》，初為3日刊，後改成日報；抗戰爆發蘇州淪陷前夕停刊。

⁶⁸ 茉莉，〈蘇州三大報之生存競爭，吳縣明報呼籲全國報界〉，《蘇州民聲》，蘇州，1936年3月28日（剪報檔案，無註明版次）。

⁶⁹ 憶秋，〈蘇滬二報聯合發行，吳縣派報工會反對中〉，《大吳語》，蘇州，1936年3月23日（剪報檔案，無註明版次）。1929年5月郭子良創辦《大吳語》，陸秋心任主編，1936年停刊。

⁷⁰ 〈報界託辣斯，欲包辦蘇州輿論，吳縣明報攜手反對，早報主人前後矛盾〉，《大公報》，天津，1936年3月28日（剪報檔案，無註明版次）。《大公報》此文，與同一天蘇州《吳縣晶報》末香寫的〈反對新聞報早報聯合〉，內文完全一樣，版面樣式也類似，《吳縣晶報》的該名作者，可能身兼《大公報》蘇州特約通訊員。

⁷¹ 「余樹立致汪伯奇、汪仲韋函」（1936年4月2日），〈新聞報館與外地同業糾紛卷〉，《申報新聞報檔案》，上海市檔案館藏，檔號：Q430-1-171。

⁷² 〈上海新聞報聯合發行，蘇州早報當前難關，本報二年前嚐過滋味了，試看今日兩報如何調和〉，《蘇民新聞》，蘇州，1936年3月22日（剪報檔案，無註明版次）。

3 月 27 日《吳縣日報》刊出〈請全國新聞界同業公論並敬告上海新聞報〉時，也舉此例打擊《早報》：兩年前（1934）《新聞報》與《蘇民新聞》商議聯合發行時，同業曾援引中宣會第六十二次議決，請中央解釋處理。當時《早報》也加入反對行列，負責人顏益生是晉京請願代表之一，呈請解釋呈文還是他起草的，「今則出爾反爾，自願損失信譽」。《早報》負責人夏旦初、顏益生，「均為國民黨黨員」，但「對中央命令最高黨部威信竟亦不顧，殊為遺憾」。⁷³ 這份啟事雖在罵《早報》，但無形間引發《蘇民新聞》的心頭舊恨，27 日在其夕刊質疑《吳縣日報》的胡覺民：「今日胡覺民以不得志於職夫工會，遂不惜大聲疾呼，求援於全國新聞同業，特在該報論前，登一煌煌廣告」。「胡覺民之恐慌極度，情見乎詞，抑何狼狽若是耶？」胡覺民認為《新聞報》、《早報》聯合發行損害蘇州同業，要向二報要求賠償；但這賠償是屬於報業全體，非《吳縣日報》獨占，更何況這損害賠償還頗有疑義。因「蘇州各報第一頁上所載電報，每晚完全剪刊上海《新聞夜報》及各夕刊者」，也常轉抄其通訊社稿。故萬一上海新聞報社協同路透社等，向蘇州各報要求損害賠償，或正式公函蘇州各報，以後不准轉載各夜報，「試問吾人何法應付，何詞以對？」蘇州報紙大小有十餘家，《吳縣日報》、《蘇州明報》銷路較他報多，「查上海《新聞報》與《早報》兩社，並無抵制蘇人不准閱看《吳縣日報》之宣言」。胡覺民應召集全蘇同業開會討論，「不應以一二私人之言論，假借公眾之口氣，而自以為其勢力亦可以左右一切也」。⁷⁴ 28 日《大吳語》也撰文聲援《蘇民新聞》，認為「庶幾言詞得體，較為實在」，「言之不無成理」。⁷⁵

伍、決戰南京：國民黨中宣會的角色

《吳縣日報》、《蘇州明報》抵制《新聞報》、《早報》聯合發行，除動員報伙工會拒送、登報訴諸輿論外，還透過政治的私下運作。因《新聞報》為全國第一大報，在

⁷³ 〈請全國新聞界同業公論並敬告上海新聞報〉，《吳縣日報》，蘇州，1936 年 3 月 27 日（剪報檔案，無註明版次）。

⁷⁴ 〈試看新聞報早報兩社如何下臺，吳縣日報社大呼籲，公共利益當由公共主張〉，《蘇民新聞》，蘇州，1936 年 3 月 27 日（剪報檔案，無註明版次）。

⁷⁵ 太乙，〈吳縣明報反對新聞報早報聯合發行，蘇民新聞又殺出一個程咬金來〉，《大吳語》，蘇州，1936 年 3 月 28 日（剪報檔案，無註明版次）。

蘇州的擴展不為國民黨所樂見，《吳縣日報》、《蘇州明報》見縫插針，挑動南京黨政機關的敏感神經。3月27日《吳縣日報》刊出〈請全國新聞界同業公論並敬告上海新聞報〉的前一天（26日），即向國民黨中宣會、行政院內政部、江蘇省黨部、江蘇省政府寄出抗議呈文，請求出面阻止。⁷⁶ 新聞報館檔案裡有許多往來南京的函電，證明不論《新聞報》或《吳縣日報》，都察覺上海、蘇州兩地的發行糾紛，南京實為最後決戰地。

對《新聞報》來說，易地發展不是首次發生，受到國民黨的刁難亦非全無經驗，故早在《吳縣日報》3月26日寄出抗議呈文前4天（22日），就猜到對手會向南京求援。《新聞報》透過南京分社就近疏通，解釋該報並未違反中央「不得易地發行附刊、不得分次送報、不得免費贈送」的三個原則：一、《早報》是蘇州已發行兩年的獨立報紙，非《新聞報》易地發行附刊；二、二報聯合發行一起派送，沒有分次送報的問題；三、免費贈送的疑點，在22日《新聞報》允諾報伙工會加價後，至少在聯合發行的廣告中，已不再強調看一報送一報。⁷⁷ 南京分館的余樹立連日拜訪中宣會副主委方希孔及主管科長，探知蘇州各報尚未有呈文送來；中宣會表示，若有呈文會按中央決議辦理；但承諾會找本報商榷，「斷不令素有歷史之本報稍蒙不利」。⁷⁸

與《新聞報》聯合發行的《早報》，則在蘇州幫忙探查對手動作。《吳縣日報》、《蘇州明報》於3月26日向中宣會、內政部、省黨部、省政府寄出抗議呈文，就是27日中午《早報》寄來的情報，信中並報告《吳縣日報》的〈請全國新聞界同業公論並敬告上海新聞報〉今日（27日）已刊出。⁷⁹ 上海新聞報館收到信後，當晚立即快寄南京分館，表示《吳縣日報》刊出的反對啟事，「恣意攻擊本報」，已擬妥解釋呈文，

⁷⁶ 「顏益生致汪仲韋函」（1936年3月27日），〈新聞報館關於廣告、財務、報紙等事務卷〉，《申報新聞報檔案》，上海市檔案館藏，檔號：Q430-1-253。

⁷⁷ 「曹慎之致南京分社函」（1936年3月22日），〈新聞報館與外地同業糾紛卷〉，《申報新聞報檔案》，上海市檔案館藏，檔號：Q430-1-171。

⁷⁸ 「余樹立致汪伯奇函」（1936年3月24日），〈新聞報館關於廣告、財務、報紙等事務卷〉，《申報新聞報檔案》，上海市檔案館藏，檔號：Q430-1-253。

⁷⁹ 「顏益生致汪仲韋函」（1936年3月27日），〈新聞報館關於廣告、財務、報紙等事務卷〉，《申報新聞報檔案》，上海市檔案館藏，檔號：Q430-1-253。

請即刻遞交。⁸⁰ 28 日余樹立電覆上海新聞報館，說明呈文已送達中宣會，「當局允考慮秉公辦理」。⁸¹

新聞報館動員人脈幫忙疏通，3 月 31 日南京分館的陶孝宗致函內政部友人——總務司長楊小巖，請他向各方解釋：聯合發行與中宣會議決無抵觸，「目的在減輕同時訂閱兩報者之負擔」，「在合理範圍內，略為宣傳文化之職責」。⁸² 同日新聞報館董事錢新之、監察人葉琢堂、總理汪伯奇聯名致信南京中宣會主委葉楚傖，澄清該報原在蘇州賣 5,000 份，現跌到 2,000 份，聯合發行「目的在維持原有銷售數，同時減輕讀者之消費負擔」；但《吳縣日報》登報反對，指責為免費贈報，增加之 1 角 5 分，「為報伋力錢，殊無根據」，請主持公道。⁸³ 對照 3 月 20 日《新聞報》、《早報》簽約條文、21 日二報的聯發廣告，最初的確是免費贈報；月增 1 角 5 分，是 22 日與報伋工會和解的結果，也確實是報伋力錢。事後的加價結果，被新聞報館拿來自清，反過來指責對手抹黑，可見糾紛的激烈程度。

汪伯奇致信中宣會後卻不見回音，只好透過南京分館繼續活動。4 月 2 日余樹立致信汪伯奇回報消息，連日數訪內政部、中宣會，單位間互踢皮球：內政部表示尊重中宣會的意見，中宣會新聞處長彭革陳說會盡量幫忙，但余樹立加註「此係官話」幾字，暗示此人不可靠。中宣會副主委方希孔說已收到《新聞報》來信，對《新聞報》極諒解，個人認為與中央決議沒有抵觸，但他「再三叮囑此為私人談話」，中宣會以主任委員葉楚傖的意見為依歸。⁸⁴ 但葉楚傖「此公現甚忙，常數訪不晤」，終於等到人時，卻表達處境為難，對《新聞報》「極願幫忙」，但《吳縣日報》「則誼關同鄉」，

⁸⁰ 「曹慎之致余樹立函」（1936 年 3 月 27 日），〈新聞報館關於廣告、財務、報紙等事務卷〉，《申報新聞報檔案》，上海市檔案館藏，檔號：Q430-1-253。

⁸¹ 「余樹立覆汪仲奇電」（1936 年 3 月 28 日），〈新聞報館關於廣告、財務、報紙等事務卷〉，《申報新聞報檔案》，上海市檔案館藏，檔號：Q430-1-253。

⁸² 「陶孝宗致楊小巖函」（1936 年 3 月 31 日），〈新聞報館關於廣告、財務、報紙等事務卷〉，《申報新聞報檔案》，上海市檔案館藏，檔號：Q430-1-253。

⁸³ 「錢新之、葉琢堂、汪伯奇致葉楚傖函」（1936 年 3 月 31 日），〈新聞報館關於廣告、財務、報紙等事務卷〉，《申報新聞報檔案》，上海市檔案館藏，檔號：Q430-1-253。

⁸⁴ 中央宣傳委員會的主任委員原為邵元沖，1935 年 2 月葉楚傖接替此職，見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秘書處，〈會務（一）〉，《中央黨務月刊》，第 79 期（1935 年 2 月），頁 139。

不能不顧。⁸⁵ 葉楚傖認為聯合發行對蘇州地方報紙威脅大，《新聞報》是大報，影響應該還好，會找出雙方都能接受的辦法，只是還沒想出來。⁸⁶ 9日，余樹立再度回報上海總館：經他連日多頭解釋，《新民報》的陳銘德、《中國日報》的唐忍庵等，已不受蘇州地方報紙影響，《中央日報》程滄波也說蘇州地方報紙的請願之舉毫無道理。不過中宣會葉楚傖的言外之意，「似望我方勿過催促」，「暫持靜默為宜」。⁸⁷

南京《中央日報》是國民黨中央直屬黨報，由中宣會管轄，尋求該報支持成為《新聞報》的目標。4月7日汪伯奇、汪仲韋兄弟，以《中央日報》新廈成立為由致信該報社長程滄波，附上一個銀屏為賀禮。事實上，《中央日報》在南京市新街口建成的4層大廈於1935年10月就啟用，新聞報館於1936年4月才寄來祝賀禮物，目的當然是在拉攏。祝賀信的後半都在談聯合發行，蘇州當地報紙「誤引中宣會議決，向中宣會具呈肆意攻擊，曾在貴報刊佈廣告」，請「洞察敝報立場，於法不背，於理亦符」。⁸⁸ 程滄波收到禮物後，於4月10日回函致謝，說明《吳縣日報》等上個月（3月）來京請願，南京新聞界決定幫他們登廣告，「敝報亦隨從人後而已」，「今後自當特別加意」。⁸⁹ 此信可看出程滄波與汪伯奇、汪仲韋雖有私誼，但為跟隨同業及中央意旨，也刊登《吳縣日報》的廣告，只能跟新聞報館打聲招呼而已。

《吳縣日報》、《蘇州明報》不僅從南京國民黨下手，也於4月8日向吳縣縣長鄧翔海呈文。鄧翔海去信《新聞報》蘇州分館，表示聯合發行「不惟抵觸中央功令，抑且妨礙同行營業」，請取消聯合發行。⁹⁰ 新聞報館收到縣長公函後，立刻與蘇州《早

⁸⁵ 葉楚傖是江蘇省吳縣周莊人。

⁸⁶ 「余樹立致汪伯奇、汪仲韋函」（1936年4月2日），〈新聞報館與外地同業糾紛卷〉，《申報新聞報檔案》，上海市檔案館藏，檔號：Q430-1-171。

⁸⁷ 「余樹立致汪伯奇、汪仲韋函」（1936年4月9日），〈新聞報館與外地同業糾紛卷〉，《申報新聞報檔案》，上海市檔案館藏，檔號：Q430-1-171。

⁸⁸ 「汪伯奇、汪仲韋致程滄波函」（1936年4月7日），〈新聞報館關於廣告、財務、報紙等事務卷〉，《申報新聞報檔案》，上海市檔案館藏，檔號：Q430-1-253。

⁸⁹ 「程滄波覆汪伯奇、汪仲韋函」（1936年4月10日），〈新聞報館關於廣告、財務、報紙等事務卷〉，《申報新聞報檔案》，上海市檔案館藏，檔號：Q430-1-253。

⁹⁰ 「鄧翔海致新聞報蘇州分館函」（1936年4月8日），〈新聞報館與外地同業糾紛卷〉，《申報新聞報檔案》，上海市檔案館藏，檔號：Q430-1-171。

報》分頭撰寫解釋呈文，13 日透過李徵會計師呈給鄧縣長。⁹¹

鎮江是另一個活動的據點，3 月 24 日《新聞報》南京分館余樹立的信就猜測：「蘇州各報會將聯合蘇省各埠地方報紙」大規模抗爭，蘇省當局「向為主張發展地方報紙」，「當先向鎮江方面活動」。⁹²《新聞報》去信鎮江分館的卜士璇，要求他收集情報並向各方活動。⁹³ 30 日卜士璇覆信表示，探知《吳縣日報》透過蘇州報業公會、新聞記者公會，拜託各地報紙刊出廣告，鎮江的《蘇報》、常州的《武進商報》都已刊登。《蘇州明報》的張叔良還打長途電話到鎮江，動員《新江蘇報》包明叔向江蘇新聞學社提議召開緊急會議，擬「聯合蘇錫常鎮及江北等處地方報館及江蘇新聞學社理事名義，具呈中央黨部」。⁹⁴

新聞報檔案裡有關蘇州聯合發行的資料，就以江蘇新聞學社為最後一件，時間是 5 月 12 日。《新聞報》鎮江分館卜士璇致信上海新聞報館，說明江蘇新聞學社已於 5 月 10 日在鎮江開會，議決聯合發行有礙同業發展，要設法遏止。推陳康和、包明叔、王振先於 5 月 13 日從鎮江去蘇州，和《早報》顏益生進行調解。卜士璇在信中對該學社做了介紹：1935 年 10 月在鎮江成立，理事有《蘇州明報》社長張叔良、《蘇報》社長陳康和（前國民黨省黨部委員）、《新江蘇報》社長包明叔（兼《申報》申報、上海《大公報》鎮江訪員）、國民黨省黨部財務委員會副主任王振先（小型報《江蘇日報》經理）。⁹⁵ 江蘇新聞學社的黨政色彩如此濃烈，《蘇州明報》社長張叔良又身為理事之一，《新聞報》、《早報》無法疏通黨政高層，聯合發行案也就不了了之。

有意思的是，聯合發行破局後，同年 12 月《新聞報》又謀與《早報》夏旦初推出《小早報》。合約與先前《早報》案差不多，相異處在於《小早報》是四開小報，

⁹¹ 「新聞報館致李徵函」（1936 年 4 月 11 日），〈新聞報館與外地同業糾紛卷〉，《申報新聞報檔案》，上海市檔案館藏，檔號：Q430-1-171。

⁹² 「余樹立致汪伯奇函」（1936 年 3 月 24 日），〈新聞報館關於廣告、財務、報紙等事務卷〉，《申報新聞報檔案》，上海市檔案館藏，檔號：Q430-1-253。

⁹³ 「曹慎之致卜士璇函」（1936 年 3 月 28 日），〈新聞報館關於廣告、財務、報紙等事務卷〉，《申報新聞報檔案》，上海市檔案館藏，檔號：Q430-1-253。

⁹⁴ 「卜士璇覆曹慎之函」（1936 年 3 月 30 日），〈新聞報館關於廣告、財務、報紙等事務卷〉，《申報新聞報檔案》，上海市檔案館藏，檔號：Q430-1-253。

⁹⁵ 「卜士璇致曹慎之函」（1936 年 5 月 12 日），〈新聞報館關於廣告、財務、報紙等事務卷〉，《申報新聞報檔案》，上海市檔案館藏，檔號：Q430-1-253。

而非像《早報》是大報；還有《新聞報》每月給夏旦初編校費 150 元、排印費 150 元，這也是之前《早報》案沒有的。《新聞報》做出讓利，如《小早報》可轉載《新聞報》的長篇小說；《新聞報》著眼更實際的利益，如《小早報》的廣告需以《新聞報》未登為原則，《新聞報》以自己名義推銷之廣告，高 7 吋寬 1 吋以內《小早報》不收費。⁹⁶ 因《小早報》是份小報，故不受國民黨中宣會「第六十二次議決」規範，也沒引起蘇州報界的抵制。

矛盾的是，幾年來《新聞報》歷經波折、現在終於成功的聯合發行，半年期滿後《新聞報》卻自行解約。從《新聞報》蘇州分館致上海總館的檢討信中，可知聯合發行實施後的成效不如預期。《新聞報》的問題不在贈報而是報價太貴，因蘇州「閱戶均貧，賤價節省經濟之故」，當地便宜的報紙《吳縣日報》、《蘇州明報》、《早報》仍最受歡迎。信中並舉《申報》、《大光明報》為例，《大光明報》是顏益生在蘇州辦的四開小報，稍早於《新聞報》、《小早報》合作案，上海《申報》、蘇州《大光明報》先開始聯合發行，合約期滿後《申報》不再續約。⁹⁷ 雖然蘇州已是江南重要城市，但比起上海，兩地的消費力還是有差；聯合發行除有來自政界、報界的阻力，讀者的接受度也是個考驗。

陸、結論

按照新聞史的說法，1930 年代由於國家統一、戰爭相對減少，工商廣告充沛，報紙銷售量突破，中國報業進入企業化發展的階段。身為全國第一大報的上海《新聞報》，銷售量來到史上的高點——15 萬份，並發展成報業集團，推出附屬刊物《新聞夜報》等。

新聞環境日益成熟，1930 年代上海新報輩出，3 日刊的小報改成每日出版，成舍我辦的小型報《立報》異軍突起，衝擊上海原有的報業市場。加上時局變遷，極富盛名的天津《大公報》南下上海辦報，擠壓《新聞報》的獲利空間。《新聞報》盛極而

⁹⁶ 「新聞報蘇州分館致上海新聞報總理、協理函」（1936 年 12 月 19 日），〈新聞報館與外地同業糾紛卷〉，《申報新聞報檔案》，上海市檔案館藏，檔號：Q430-1-171。

⁹⁷ 「新聞報蘇州分館致上海新聞報總理、協理函」（1937 年 5 月 12 日），〈新聞報館與外地同業糾紛卷〉，《申報新聞報檔案》，上海市檔案館藏，檔號：Q430-1-171。

衰，銷售量停滯不前。

為求突破，《新聞報》開闢第二戰場，積極推廣外埠市場，鄰近的江蘇、浙江城市成為目標。1933 年起，《新聞報》試過另外出版杭州、京滬路外埠附刊，也與蘇州《蘇民新聞》、武進《常州新聞》、蘇州《早報》、蘇州《小早報》醞釀過聯合發行。《新聞報》的促銷手法多元，提早附刊送達時間，增加地方新聞內容，並以買一報送一報方式吸引讀者。

與《新聞報》合作的地方報紙多為新創辦、或是規模較小的報紙，企圖與《新聞報》相互加成。因《新聞報》挾著上海大報的雄厚資本而來，影響其他地方報紙的利潤，遂聯合起來抗爭，以「大資本併吞小資本」⁹⁸ 為訴求，對《新聞報》進行輿論撻伐。

1930 年代的政治環境是一黨專政之訓政體制，地方報業嗅出國民黨對上海大報的控制慾望，撥動國民黨的政治敏感神經，幾次的反《新聞報》聯合發行案，都走呈請中宣會介入的路線。1933 年初《新聞報》推出杭州版，中宣會就祭出「第六十二次常務會議決議」，切斷《新聞報》異地發行的可能。1934 年《新聞報》相繼與蘇州《蘇民新聞》、武進《常州新聞》醞釀聯合發行，主打買一報送一報，中宣會擴充「第六十二次常務會議決議」，加入不許免費贈送他報的規定。

1936 年 3、4 月《新聞報》與蘇州《早報》的聯合發行，是幾方勢力衝突的高峰。即便《新聞報》修正合作方式，加價補貼報販力錢，使蘇州《早報》不算免費贈送；但蘇州同業串連全國報業抵制，「反報業托拉斯」的輿論銳不可擋，加上國民黨中宣會的態度強硬，《新聞報》奔走南京、疏通無果，最後只好撤銷在蘇州的擴展計畫。

⁹⁸ 〈請全國新聞界同業公論並敬告上海新聞報〉，《吳縣日報》，蘇州，1936 年 3 月 27 日（剪報檔案，無註明版次）。

徵引書目

一、檔案

《申報新聞報檔案》（上海，上海檔案館藏）

〈一年來三報銷售數一覽表〉。

〈申報館各種調查統計登記表〉。

〈各個時期新聞報與主管機關報送關於主要職員工人工況調查〉。

〈抗戰前新聞報兼辦新聞夜報、上海導報、晚報文書的文件〉。

〈復刊一年來發行統計〉。

〈新聞報館 1930-1949 年股東常委會會議紀錄及董事會決議〉。

〈新聞報館內部通告〉。

〈新聞報館與外地同業糾紛卷〉。

〈新聞報館關於廣告、財務、報紙等事務卷〉。

二、史料彙編

《新聞報概況》。上海：新聞報館，1931 年，上海圖書館藏。

申報館編，《最近之五十年》，下冊，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第 90 輯。臺北：文海出版社，1923 年。

三、年鑑、辭典

申報年鑑社編，《申報年鑑》。上海：申報售書科，1933 年。

四、報紙

《大公報》，天津，1936 年。

《大吳語》，蘇州，1936 年。

《早報》，蘇州，1936 年。

《吳縣日報》，蘇州，1936 年。

《吳縣晶報》，蘇州，1936 年。

《武進中山日報》，武進，1933 年。

《新聞夜報》，上海，1936 年。

《誠報》，上海，1936 年。

《蘇民新聞》，蘇州，1936 年。

《蘇州民聲》，蘇州，1936 年。

《蘇州明報》，蘇州，1936 年。

五、專書

中國晚報工作者協會學術委員會主編，《中國晚報學》。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01 年。

方漢奇主編，《中國新聞事業通史》，第 2 卷。北京：人民大學出版社，1996 年。

王凌霄，《國民黨新聞政策之研究（1928-1945）》。臺北：中國國民黨黨史會，1996 年。

吉建富，《海派報業》。上海：文匯出版社，2010 年。

成舍我，《報學雜著》。臺北：中央文物供應社，1956 年。

李楠，《晚清民國時期上海小報》。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6 年。

周雨，《大公報史》。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3 年。

孟兆臣，《中國近代小報史》。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5 年。

洪煜，《近代上海小報與市民文化研究（1897-1937）》。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7 年。

徐鑄成，《徐鑄成回憶錄》。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9 年。

徐鑄成，《報海舊聞》。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 年，北京第 1 版。

秦紹德，《上海近代報刊史論》。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1993 年。

馬光仁主編，《上海新聞史（1850-1949）》。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1996 年。

張靜廬，《中國的新聞記者與新聞紙》。上海：光華書局，1930 年。

陶菊隱，《記者生活三十年——親歷民國重大事件》。北京：中華書局，2005 年。

曾虛白，《中國新聞史》，上冊。臺北：政治大學新聞研究所，1966 年。

曾虛白，《曾虛白自傳》，上集。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8 年。

黃天鵬，《天廬論叢》。臺北：黎明文化事業公司，1981 年。

趙君豪，《中國近代報業》。臺北：文海出版社，1983 年。

六、期刊論文

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祕書處，〈中央祕書處致中央宣傳委員會函〉，《中央黨務月刊》，第 56 期（1933 年 3 月）。

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祕書處，〈會務（一）〉，《中央黨務月刊》，第 79 期（1935 年 2 月）。

古曉峰、趙宗強，〈民國時期報業市場的利益與政治紛爭——1936 年上海新聞報在蘇州的發行糾紛事件〉，《新聞大學》，總第 888 期（2006 年第 2 期）。

汪仲章，〈又競爭又聯合的新、申兩報〉，《新聞研究資料》，總第 15 輯（1982 年 8 月）。

汪仲章，〈我與新聞報的關係〉，《新聞研究資料》，總第 11 輯（1982 年 5 月）。

汪仲章，〈新聞報發展過程拾零〉，《新聞研究資料》，總第 23 輯（1984 年 1 月）。

胡道靜，〈新聞報四十年史（1893-1933）〉，《報學雜誌》，第 1 卷第 2 期（1948 年 9 月 16 日）。

陶菊隱，〈新聞報發家史〉，《文史資料選輯》，第 4 輯（1980 年 12 月北京第 3 版）。

諸家瑜，〈帶吳字的蘇州老報紙〉，《中國地方誌》，2007 年第 8 期（2007 年 8 月）。

七、學位論文

古曉峰，〈民國時期申報經營管理研究——兼與新聞報的比較〉。上海：復旦大學中國近現代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7 年。

詹佳如，〈報界、商界與政府：1929 年新聞報股權事件〉。上海：復旦大學新聞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10 年。

